

中國現代文藝研究批判叢刊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何礼蔚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八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句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361,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书号：10078·3446 定价：1.80元

目 录

蒋光慈在东京	任 钧 (1)
蒋光慈事迹考	瞿光熙遗作 (16)
读了《穷汉的穷谈》之闲话	
——致郭沫若先生的一封信	蒋光赤 (42)
介绍新发现的蒋光慈致郭沫若的佚信.....	哈晓斯 (45)
闻一多集外诗(附译诗四首)	(49)
关于《闻一多集外诗》的说明.....	刘 煊 (78)
闻一多佚诗四首	(80)
闻一多佚诗抄录附识.....	孙玉石 (83)
《歌谣》周刊始末	张紫晨 (86)
我国二十年代的三种诗刊	陆耀东 (108)
中国诗歌会机关刊物《新诗歌》目录.....	蔡 青辑 (131)
油印本《新诗歌》集月拾记.....	刘锦满 (138)
“忆韬奋”特辑	
回忆韬奋先生	钱小柏 (144)

难忘的教诲 莫志恒 (168)

韬奋在梅县江头村隐蔽的日子里

..... 陈启昌遗著 (173)
忆韬奋伯伯在江头村 陈汉辉述 加 力整理 (187)

鲁迅与日本浮世绘 姜德明 (202)

鲁迅在南京教育部若干史实考证 王尔龄 (211)

鲁迅与《少年先锋》 李 江 (220)

有关郑成功资料的备忘录 郭沫若 (237)

少年郭沫若“偷桃”的对子是假的 王锦厚 (240)

《沫若文集》未收文章目录 萧斌如 邵 华 (243)

回忆创造社郑伯奇同志 赵景深 (277)

关于王以仁其人及他的诗歌和小说 许 杰 (280)

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 范 泉 (303)

殷夫烈士光辉的一生 盛孰真 (315)

殷夫著译选本校阅札记 康 锋 (321)

瞿秋白研究资料简目补遗 王宏志 (331)

瞿秋白研究资料简目补遗续补 王铁仙 (342)

一九三四——三五年间的《社联盟报》介绍 刘华庭 (358)

《新月》月刊出版日期考 王锦泉 (361)

南国社大事记 沈仍福编 (367)

茅盾幼名、名、号、别名、化名、笔名

辑录 艾 扬 (390)

郑振铎著译编校书目 陈福康编 (419)

《〈孩儿塔〉未刊稿三十首》校正 编 者 (455)

姊姊的屈服(续) 卓 如 (458)

《中华日报·动向》总目 上海图书馆辑 (464)

补 白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积极编纂中 竹 (77)

《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出版 林 (82)

郭沫若《归国杂吟》之二的一个注释有误 潘振铎 (112)

《烽火》已影印出版 吴 锋 (130)

关于《骆驼祥子》的初版日期 陈朝华 (142)

《故乡》——

胡也频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 赵南荣 (167)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编委、出版工作会

议在广东肇庆举行 文 秋 (186)

《宋庆龄与鲁迅》补遗 善 文 (210)

《草鞋脚》和《活的中国》出版 沪 讯 (219)

田汉、蒋光慈与皮涅克的一段往事 肖 希 (236)

《鲁迅著作版本丛谈》在京出版 兴 树 (242)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已出三辑 华 闻 (314)

对《于伶著作书目》的一点补充与订正 朱金顺 (320)

殷夫诗中的 Beatrice 景 玉 (330)

- 《苏区文艺运动资料》即将出版.....严 维 (357)
《张天翼著作目录》补正.....胡星亮 (360)
补充茅盾的两个笔名.....福 康 (418)
殷夫烈士亲笔签名的一本藏书.....奋 (457)
殷夫的音乐修养.....景 玉 (463)

蒋光慈在东京

任 钧

一

一九二九年夏，为了养病，光慈由上海东渡日本。因为是大热天，曾先到彼邦著名的海浴胜地房州去耽搁了十多天，然后于八月间来到东京。

东渡之前及在日本居留期间，光慈一直以为自己是害了比较严重的胃病，并没有想到其他。但据他的爱人吴似鸿《蒋光慈回忆录》^①一文所述，一九三一年时，光慈在上海经医生检查，诊断为患有肠结核和已进入第二期的肺结核病症。因此，她认为光慈在他从前的爱人宋若瑜患肺病去世以后，他自己也已患下了肺结核，并怀疑他在东渡时可能就已经患了肠结核，而不止是胃病而已。看起来，这样的怀疑是有些根据的。

按理说，光慈既然特地到日本养病，而彼邦又素以医疗条件优越著称，原应抵日后就到医院仔细检查，作出比较全面、准确的诊断，这样就不致于迟至一九三一年才发现；但由于一则光慈对自己的病情不够重视，再则显然更加重要的，就是他毕竟是个一向靠稿费维持生活的穷作家，没有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去

^①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做到这一步。

光慈到东京后，在靠近高田马场地区的一家名叫“诹访”的普通公寓里租下了一间房子。那公寓座落在市区的边沿，环境颇为幽静，周围种植了好些花木，空气清新，光慈住进去后，感到相当满意。

由于那个公寓跟我和宪章等居住的公寓相距不远，所以，自从他到东京后，我们就常常去拜访。而他，初到东京，熟人不多，因而也很喜欢找我们聊聊。

光慈曾经在苏联住过好几年，俄国话讲得很好，还会讲英语，但不会说日语。宪章比我们早一年到日本，当时一般的日语已经可以对付了；因此，当光慈碰到一些要由会讲日语的人去做的事情，都由宪章义不容辞地一手包办。

二

据我所知，作为一个作家，光慈在写作上是极其勤奋的。虽说他到东京是为了养病，但由于不能不借此换取生活费用，当他搬进公寓里住定之后，就马上开手从事译、作。

首先，在八月底即着手继续翻译在国内时已向书店预支过版税、却还来不及译完的苏联作家别津斯基的小说《一周间》。约莫费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译完了。当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时，他表现得异常兴奋和高兴，还为此特地在一家中国同胞开设的饭馆里请我和宪章等吃了一顿饭，说是要借此庆贺他到东京后所获得的“小小的成功”。

刚刚把译笔放下没几天，光慈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

看起来，光慈早就把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酝酿成熟了。

因此，他到东京后曾一再向我们透露：一定要写好一部作品后才能考虑回国。

这一长篇的写作，从开始到完工，前后费去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应该说，进度还是比较快的。但，这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光慈在写这一作品时是“一帆风顺”、“一挥而就”的。相反地，一个象光慈般勤奋的、认真的作家，当他从事文艺创作时，总是呕心沥血的。可不是么？且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的日记中写下的两则有关的日记吧：

九月二十日：……《冲出云围的月亮》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被我写了四分之一了。我觉得越写越困难，越要耗费我的脑力。现在我起了一种思想，就是我的胃病虽又快要好了，如果我这样耗用脑力下去，我岂不更是要得着脑病吗？近来这几天睡觉已经有一点不对了，怎么办呢？我是不能丢开这部书不写的！什么都可以，让我得下脑病吧，但是这一部书是不可以中止的呵！……

十月五日：……今天所写的一节，真是太把我难为住了：又要顾及读者，又要顾及自己的艺术，又要顾及许多别的……我想，即使有一个很大的天才，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环境之中，也不能将这一节写好呵。唉，苦痛啊，苦痛……！
……

光慈在日本只是居留了短暂的几个月，除完成上述的译、著外，还写成了《异邦与故国》这本日记，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在那一段时期的、很可宝贵的真实生活的记录。

尽管如此，在九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他还是写下了对自己深

为不满的一段话：

……我觉得我的惰性太深了，如果不害着这种惰性病，那我将做出更多一点的成绩来。从今后我应当努力了吧，不努力我便是混蛋一个！

由此可见，光慈在工作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是多高、多严格呵！

三

在旅居日本期间，除我跟宪章等几个人外，光慈和本国人接触不多。其中，来往得比较多的，有已故的沈叶沉（沈西苓）。他留学日本时是学习绘画的，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后来成了戏剧、电影的导演。当他在上海和许幸之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时，还特别邀请已经从日本回到国内的光慈到该校去演讲。

光慈跟郭沫若是很熟的。当时，郭沫若已经在日本过着流亡生活。光慈曾经想去看他。但由于郭沫若住在外地，并不在东京，要去看他，比较费事；同时，也由于——这是更主要的——那时日本当局已开始实行迫害进步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宪章等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正是在光慈旅居东京期内被日本警察逮捕、监禁，然后驱逐回国的。显然，倘使在这个时候去看郭沫若，很可能会招致不利的后果，因而始终没有去。

如所周知，光慈是当时国内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创始人之一。我和宪章出国前也在上海参加了该社。光慈到东京后，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并和国内取得联系。支部（支社）成员除光慈、宪章和我三人外，还先后吸收了伍劲

锋、古公尧、胡晓春等参加。不久，适夷（楼建南）也从上海来到，他在国内就已经是太阳社的成员，当然也参加了。

宪章姓冯，原籍广东兴宁县，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我在中学念书时的同学。在中学时，他已对“五四”以来的我国新文学，尤其是新诗发生浓厚的兴趣。他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后，他就认识了光慈、阿英（钱杏邨），旋即参加了刚成立的太阳社，并在该社主编的刊物，如《太阳月刊》等上面发表了不少诗作，还出版了诗集《梦后》。他所写的诗歌，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明显地受到过光慈的影响。他对光慈是很尊敬的。

宪章是在十月间被日本警察逮捕、监禁，并在光慈回国前后被无理驱逐回国的。一九三〇年当“左联”正式宣告成立时，他已在上海，参加了成立大会。不幸的是，没有多久，他就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判处三年徒刑，于一九三一年死在牢里。去世时，只有二十多一点。

我们知道，光慈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去世的，而宪章也是在同年同月结束了比光慈更加短促的生命！真是一桩叫人伤心的巧合！不同的是，光慈在贫病折磨下离开人世，而宪章则在敌人的残酷迫害下死在狱中！

伍劲锋和古公尧也是中共党员，也同为我在中学时的同学。他们在参加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前，都曾由光慈亲自分别跟他们谈话，征求意见。

劲锋在宪章被日本警察逮捕时也被逮捕、监禁，后来也被驱逐回国。回国后，由于继续参加革命活动，也跟宪章同样遭受反动派的拘捕、被判处徒刑，死于狱中！

公尧也遭受到宪章和劲锋的同一命运，不同的是：如上所述，宪章和劲锋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没有好久就被驱逐回国，而

公尧却跟其他几十个中国进步留日学生一样，被囚禁了一年多才放出来，然后再驱逐回国。

公尧回国后就回到广东家乡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过我们当年的母校的中学校长。由于长远没有联系，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健在。

胡晓春，我过去并不认识他，也记不起是经谁介绍参加支部（支社）的。自从一九三二年我离日回国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一点也不了解他其后的下落。

记得小小的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是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我们居住的公寓里举行的一次社员会议上宣告成立的。

开会时，首先由光慈谈成立支部（支社）的意义和任务以及当前要做的工作。后来，大家还就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天，光慈的精神特别好，我们大家也都感到很高兴。

会后还由光慈掏腰包请我们在附近的一家中国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借以庆祝支部（支社）的诞生。

四

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成立后，还开过一二二次会，主要是谈国内文坛的情况，也谈到一些日本文艺界的现状。

在一次支部（支社）会议上大家的谈锋转到了有关光慈新创作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

光慈这部中篇小说写成于一九二九年四月间。最初在太阳社的机关刊物《新流月报》上连载（从三月间出版的创刊号到十二月出版的第四期登完），同年八月出版单行本。

作品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它主要叙述了一个在十月革命后

逃亡国外的白俄贵族妇女丽莎，流落上海，沦为娼妓，最后终于自杀而死的故事。

非常明显，作者的主观意图，无非是要借此来反衬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巩固和发展。

但，出乎作者意料之外，作品一出版，很快就在党内受到某些同志的批评和指摘。对此，光慈是有不同意见和抵触情绪的。在《异邦与故国》九月三十日的日记里他曾经写下过这么几句话：

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生命，如果他的作品的真价被人所误估了，或者竟为人所完全不了解，那他该是多末苦痛呵！……

毫无疑问，这正是他当时的想法和情绪的真实表现。

可是，由于我们当时并不了解情况，而光慈也没有跟我们谈起过；因而当支部（支社）会议中谈到他这部作品时，我们只能根据读后所感随便谈谈。记得那一天宪章谈得很多，我也讲了一些意见。当我们谈过之后，光慈还很谦虚地认为我们把作品的好处谈得太多了些，希望更多地指出一些缺点。最后当我们要求他也谈谈自己的意见时，他却表示没有什么话好说。事后才了解，这其实也正表明他有委屈情绪。

我们知道，从一九二九年末到一九三〇年，在《现代小说》、《拓荒者》等刊物上曾陆续登出公开批评《丽莎的哀怨》的文章。当时，宪章已被日本警察驱逐回国，住在上海。他读到了那些文章以后，殊觉不以为然，就写了一篇表示不同意见的评论，发表在《拓荒者》第三期上。在他那篇评论中，肯定了这部小说的内容，同时认为在形式上也值得借鉴。但宪章的意见很快就受到

了批驳。

当时批评这部作品的意见是，认为它只能引起读者对旧俄没落贵族的同情，……关于光慈这部作品如何评价的问题，不属于我这篇回忆文章的范围，我只是叙述一些当时的历史事实，以供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从今天的角度来实事求是地评价这部作品时的参考。

五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从家乡来到上海以后才认识光慈的。当时尽管我已经参加了太阳社，但由于处身于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见面的机会不多，因而彼此并不怎么熟悉。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彼此都来到了东京，有机会经常碰头，这才逐渐对他的为人、性格，以及思想作风等等有了较深的了解。

我觉得光慈很坦率、平易、诚恳、和蔼可亲；因而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很愿意跟他交朋友。

他对年轻同志的关心和爱护，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论年纪，他并不算大，当时还不满三十；但跟只有二十左右的我们相比，毕竟要超出十岁左右。再加上那时他已在我国文坛上做出了好些成绩，这样，他无形中在我们中间变成了一位颇有威信的“老大哥”，当我们在政治或文艺方面碰到什么疑难问题都不免要去向他请教；他也总是尽其所知地乐于跟我们谈论，毫无厌倦之色。在太阳社东京支部（支社）成立的前后，宪章、公尧、劲锋等都曾把自己写的或是翻译的文稿拿给他看；他也总是笑眯眯地接了下来，尽快地抽出时间阅读，并毫无保留地谈他的意见。

我在出国之前曾写过一部题为《爱与仇》的中篇小说。到东

京后，也请光慈看。没想到，头一天晚上给他，第二天他就抽空看完了，并马上找我谈，提了不少富有教益的意见，这使我很感动。尤其使我感到惭愧万分的，就是，到《异邦与故国》出版后，我才知道，原来在九月十一日那天的日记中，他还极其关怀和深情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上午回来小睡了一会，起来将森堡的中篇小说《爱与仇》用心地看了一遍。取材、主旨、描写各方面都很不错，确是一部很好的小说。虽然瑕疵是有的，可是他初作即能有如此的成绩，那的确是很难得的了。如果他就此努力下去，的确很有大成就的希望，这中篇小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押礼而已。我的年青的朋友呵！努力吧！那伟大的光荣在等着你！……

当我如今又一次读到光慈在五十多年前写下的这一段话，深感于自己主要由于主观努力不够，以致完全辜负了他当年对我的期许时，真不能不惶愧到无地自容呵！

光慈对我这部习作，不但曾经仔细看过原稿，当他回到上海后，还把它拿到《拓荒者》杂志上发表，后来又编入“拓荒丛书”，交给书店出版。可惜这部曾获光慈关怀的小书，在一九三四年初，就跟其他一大批进步书刊一起，被反动派加上所谓“宣传赤化”的罪名，明令查禁，解放后又经过“十年浩劫”，如今连我自己的书架上也找不到它的踪影了。

六

由于想要跟日本作家互相交流中国和日本进步文艺运动的

情况，光慈到了东京没有几天，就打算找藏原惟人和藤枝丈夫等进步作家碰碰头。

藏原惟人是日本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同盟的成员，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有名气的进步文艺理论家。由于他的文章有不少曾被翻译成中文，因而他对中国读者也并不陌生。早年他曾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专攻俄语，毕业后又到莫斯科去学习过两年；因此，他精通俄语，曾将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文艺论著《艺术与社会生活》等翻译成日文，成为著名的翻译家。据光慈说，藏原的俄语讲得很流利，发音正确，没有一般日本人讲外语时所表现出来的缺点和毛病。

由于彼此都有进步的思想和观点，又不存在语言方面的隔阂，所以自从认识藏原后，光慈就常常到他家去看他，而且总是谈得很多，很广泛，很高兴，很投机。

他们有时谈到中国、俄国和日本的进步文坛；有时谈到俄国当时所提倡的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以及它是否受到未来主义的影响；有时还谈到文学工作和实际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等等。

光慈对于被称做俄国最后的田园诗人叶赛宁（旧译为“叶贤林”）的诗作很喜欢。他曾经有好几次跟我们谈到这位诗人及其作品。有一次当他到藏原家时，也跟他谈到叶赛宁。据光慈说，他没有想到，藏原也跟他同样，非常爱好叶赛宁的诗歌，其爱好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因为藏原能够成首地把叶赛宁的诗背诵出来，而他自己能够记牢的却不多。光慈对于这一意外的发现显然感到惊奇和满意。

光慈第一次到藏原家里去时，陪同前往的藤枝丈夫把自己随身带去的一本《丽莎的哀怨》拿出来给藏原看，并向他说明这是光慈的近作。当时光慈就把该书的内容大致告诉了他。藏原

认为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可惜他不懂中文，不能读它。自然，光慈并没有对他谈及当时国内某些同志对这部作品的批评。

跟藏原认识以后，光慈还陆续向他借了好些俄文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长篇小说来阅读；因为他出国时行李中几乎没有携带什么书籍。

除藏原外，光慈跟藤枝丈夫也搞得很熟。

藤枝也是日本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同盟的成员。同时又是个“中国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由于他早年曾在我国东北流浪过，因而还能够讲中国话。为了了解并研究有关中国的各项问题，他一向跟中国留学生颇多接触。当光慈还没有来到日本之前，宪章他们已经跟他认识了，后来我也跟他有来往。

光慈和他碰头之后，觉得他颇象一个中国式的温文尔雅的书生，而不很象日本人。而且，大概由于他曾在我国东北居住过的缘故，在生活上还保留着一些中国人的习惯。这就使得他们两人容易接近。不久，不但藤枝本人，连他的夫人和四岁的女孩子也跟光慈很相熟了。

通过跟藤枝的交往，光慈了解了有关日本文坛乃至社会的多种情况；光慈也解答了对方提出的有关中国文艺界及其他的各项问题；初步达到了互相交流的目的。

可是，到了十月中旬，有一天光慈到藤枝家去时，只见到他的夫人，没有碰到他。她告诉光慈，由于耽在家里不大安全，他早就住到朋友家里去了。这样，光慈只好马上离开，从此就没有再去看过他。

藤森成吉，他是日本进步文艺界的前辈之一。光慈跟他见过一面，后来也曾经打算去看看他，但终未如愿。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光慈又去看藤枝，并在他家吃饭。饭后，藤枝夫妇邀他一同到帝国剧场去看